

吳啟訥	人羣分類與國族整合——中共民族識別政策的歷史線索和政治面向	319
張中復	民族國家、族群意識與歷史解釋的互動意義——以海峽兩岸「回族」認定為例	395
作者簡介		429
索引		433

導論

同中有異的兩岸黨國體制

余敏玲

1949年10月，毛澤東在北京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從此形成國共政權在兩岸長期對峙的局面。由於國共相左的意識形態，在實際上又分屬兩個不同的陣營，從而開啓了亞洲冷戰史關鍵的一頁；同時也使得冷戰時期兩岸歷史發展邁向新的階段。

早期關於美蘇對立的冷戰時期研究，西方學界主要是政治學者的天下，後來慢慢有經濟學者和社會學者加入；歷史學者由於能夠直接掌握的史料不足，長期缺席。這個現象到1991年蘇聯解體，檔案大量開放之後，迅速改觀。西方歷史學者投入冷戰時期研究日多，臺灣則明顯落後。有感於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遂於2000年成立兩岸研究群，希望藉此推動歷史學者加入冷戰時期兩岸歷史研究的行列。自2001年起，兩岸研究群陸續舉行四次關於兩岸分治以來歷史發展的會議。第一次會議的部分成果，以「1950年代的海峽兩岸」專號的形式，刊登於第40期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其後的兩次會議則以專書形式出版。陳永發主編的《兩岸分途：冷戰初期的政經發展》，是臺灣第一本全由歷史學者撰寫的兩岸研究論文集，梳理1949年到文革之前，國共兩黨政策如何影響臺灣兩岸的政治與經濟的發展，特別重視新史料與檔案的運用。其內容包括兩岸分

立之後，國共如何鞏固政權並向美蘇學習、如何回應恢復與發展經濟問題的挑戰，以及知識份子如何重新調整與國家權力的關係。第二本是謝國興主編的《改革與改造：冷戰初期兩岸的糧食、土地與工商業變革》，探討中共如何利用「民主評議」的手段向民營公司課稅，國民黨技術官僚又如何透過建立金融機制引進外資與發展經濟；兩岸經濟體制的相反走向；臺灣國營鋁業公司如何將技術轉給民營工廠以求生存，大陸又如何透過改造將私營企業等國有化。此外，該書也比較了國共兩黨在政權分立初期糧食供應政策的異同，並重新反思兩岸的土地改革。

本書收錄的論文大多數來自於2008年6月召開的「冷戰時期海峽兩岸的社會與文化」會議。論文選擇的標準，以能夠提出新資料或新觀點為原則。各篇論文雖各有其重點，不過還是可以放在黨國體制的大框架下來討論。

這裡所謂的「黨國體制」，乃指一國之中某一獨大政黨意欲或實際掌控國家所有的資源與機構，並試圖將黨的意志和權威儘可能地滲透到政府的每個機構，甚至到社會的每個角落。同時，政府所有機構均無法獨立於黨的領導和指令之外，國中也沒有其他任何一個政黨或其他社會力量強大到可以監督、挑戰這個黨，或與之抗衡。黨政合一的結果是黨的利益優先於國家的利益。由本書收錄的各篇論文清楚地彰顯出，冷戰以來兩岸的社會文化發展，均是在黨國體制的架構下進行，無法脫離政治單獨討論，族群問題更是如此。即使後來黨國體制有所鬆動或崩解，兩岸所出現的種種問題，也必須溯及源頭，才能了解蘊結所在。

黨國體制本不全是國共最初設想的治理藍圖，不幸的是兩黨自從以俄為師之後，卻殊途同歸地邁向這條道路。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本

以憲政民主為最後依歸，然而孫逸仙主張效法蘇聯共產黨，期使國民黨成為具有戰鬥力、能夠完成統一大業的政黨，即埋下了建立黨國體制的種子。南京政府成立，國民黨號稱統一全國，實際上能夠控制的省份並未及於全國，其後又有日本侵略與國共內戰；加上黨的鬆散意識形態與組織，在大陸時期始終未能實現所欲成就的黨國體制。及至撤退來臺，由於堅持反共抗俄的政策，國民黨繼續延用1948年在南京頒行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許多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其次，國民黨統治的臺灣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相對穩定，面積又小，加上有軍隊作為後盾，要貫徹黨的意志，遠比大陸時期容易，反而真正成就了黨國體制。同時，在臺灣海峽的另一邊，中共面臨的挑戰更大。中共的建黨從一開始就與蘇聯關係密切，理念與組織也更為貼近蘇聯共產黨及其黨國體制。在中共執政之前，特別是延安整風之後，黨意的貫徹遠比國民黨徹底，這也是其能取得內戰勝利的要因之一。然而中共建政之後，所面對的再也不是侷促一隅的根據地，而是全國發展不一、土地廣大、民族雜居的中國，最終還是能使黨的指令通行全國，穩固地確立了黨國體制。

無論是蔣介石或毛澤東，在兩岸分立政權之後，其首要任務均為堅實地建立或擴大黨國體制，以鞏固政權。黨在制定政策之後，由誰執行、如何執行與宣傳黨的理念和政策，在在考驗黨國制度的建立與黨國體制之下的運作情形。蔣介石和毛澤東時代同是施行黨國體制的高峰期，但是在這三方面的發展與結果，可以看出兩者仍有不少相異之處。國共黨國體制的同中有異的對照，可以令人更為明晰地看出兩黨在本質上的區別及其所顯現的意義。

一、學術建制

黨的勢力進入學術機構，並且成爲黨國體制的一部分，是1949年之後國共，特別是共產黨，汲汲經營之所在。黨國體制在學術機構的體現，主要在意識形態的滲透與灌輸，以及黨組織的建立。在中共眼中，從國民黨接收過來的學術機構都是受到歐美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重災區」，如何掃除他們的資產階級思維和作風，如何建立與運用新的意識形態和組織，來樹立黨的權威與合法性，是中共念茲在茲的工作重心所在。過去研究已對中共重組學術機構勾勒出一外在骨架，卻缺乏內在理路的剖析。王揚宗與楊東平的文章恰恰提供許多過去無人談及的重要細節，彰顯出黨意志的執行與貫徹。西人有云：「魔鬼藏在細節裡」，正是這些魔鬼般的細節，反映出中共學術建制的核心所在。

中共建黨以來，即在校園內發展組織，儘管中共亦有共青團作爲黨的外圍組織，不過建國後黨勢力的進入校園，主要透過院系調整，設置黨組或黨委來完成，以達到改造受「資產階級毒化教育過深」的大專院校的目的。目前中國大陸出版關於院系調整及大學改革的論文或專著之中，幾乎完全沒有觸及黨的勢力如何進入高等院校。¹楊東

1 到了1950年代後半，大學均設黨委。大陸目前已出版的院系調整的著作並不少，可惜多半是陳列一堆表格，告訴讀者那些院系與大學被拆解與合併；或是只提到中共爲了因應工業化的需要，模仿蘇聯模式，展開專才教育，拆分數個歷史悠久的綜合性大學等。例如，胡建華，《現代中國大學制度的原點：50年代初期的大學改革》（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沒有提及黨的組織如何在學校運作的情形；王立誠、管蕾，《建國初期上海高校的院系調整研究》，收入吳景平、徐思彥編，《1950年代的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頁233-259。

平論文的貢獻之一即在於以清華大學爲例，清楚地說明了這個過程。在老師方面，中共透過具有黨員身分的青年教師逐漸接管系所大權；對於非黨員的資深教授或進行思想改造，或外調他校他市。民國時期著名大專院校的教授大多被調出，總數減少；大學教授也從過去可以自由選校，變成固定在某一院校的附屬品。在學生方面，黨的組織開始對學生施行政治審查。凡是過去有歷史問題或階級背景不符合當時政治標準者，多不准入學。²其次，中共利用各種教學管道與教材，積極灌輸馬列主義和階級鬥爭的觀念，進行黨化教育。再者，配合共青團的活動，在學生中物色與培養新的幹部。1953年，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率先提出從思想及學習好的學生之中，選拔擔任政治輔導員，這是中共培養又紅又專的接班幹部的重要管道。當今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清華就讀時，就曾擔任過政治輔導員。

誠如楊東平的結論指出，中共對院系調整重視拆分多於合併；目標是將1949年以前著名綜合大學，也是「崇美、親美、媚美」的重點大學肢解，特別是拆散其人文學科。中共原本計畫慢慢地進行，因爲韓戰的爆發，認爲機不可失，馬上拉高層次，打出反對美帝國主義、反封建買辦教育的口號，聲稱教育應該成爲人民民主專政的工具。這使得受美國資助的學校如清華大學、輔仁大學、燕京大學等，立即成爲被整頓與拆分的目標。拆分的結果是，許多綜合大學變成專業專才的大學，原有的教會大學全部消失。同時中共眼中所有爲資產階級服務的學科，如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均被取消。顯而易見地，院系調整不是單純的大學結構的改變，而是透過各系科日更爲專

2 1950年代初期高校已實行政治審查，雖然不如1957反右運動之後嚴格。關於政治審查，散見於回憶錄，至今未有研究專論，值得開發。

業的分化，進行人事調整，藉以改造舊的教育制度和教授的思想。

院系調整終止了中國半世紀之久，源自歐美的綜合大學制度，走向重視新意識形態與更為實用的專才教育；學門窄化，棄通才，偏專才；重理工，輕人文。事實上，這種偏專才與重理工的現象，早在1930年代國民黨即曾提出過，只是沒有實行而已。當時有人鑒於太多文法學院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建議不如發展理工等科目。再者，九一八事變的影響和學潮的關係，促使國民政府更重視實科教育。陳果夫甚至提出應停招專上文法科十年，將其經費撥給農工醫科使用；後以太過狹隘而沒有驟行。³耐人尋味的是，觀諸今日大陸又流行大學整併之風，以超大型的綜合大學為目的，這是否意味著鐘擺又向另一極端的擺盪？

反觀國民黨勢力之進入大專院校，主要以安定校園、防止學生受到共產黨「蠱惑」為前提；此乃由於國民黨認為學潮不斷是失去大陸的要因之一。1950年12月，國民黨中央在當時臺灣現有的六所大專院校成立知識青年黨部（不是青年團），多由校長或訓導長擔任黨部主任委員，同時以此監控教職員工與學生的活動。教師若有反政府、反黨言論者，小則受到約談和恐嚇，大則可能會有升遷困難或遭解聘的後果。⁴不過，國民黨與中共不同之處在於沒有思想改造，對

3 1931年10月，教育部草擬改個全國教育方案，認為當前中國教育弊端來自「個人主義及抄襲美國」。建議「應注重實科，對於文科應酌量縮減，即養成農工醫等項專門人才，對於文法等科，應逐漸裁併」。陳能治，《戰前十年中國的大學教育（1927-1937）》（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頁33-34, 50, 91。

4 根據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29次會議，訂定知識青年黨部的原則是：凡專科以上一律設置知識青年黨部，由中央直接領導。龔宜君，《「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1950-1969）》（台北：稻鄉出版社，1998），頁111-120。

學生也沒有政治審查。其所施行的黨化教育也只是在1950年恢復三民主義為大學共同必修課，⁵並且沒有要求用三民主義來詮釋所有的學科（包括自然學科）。同時，國民黨也沒有將臺灣的大學原有科系進一步細分成更為狹窄的專才化大學。

1950年代的國民黨勢力進入大專院校，實際上共有三個管道：知青黨部、軍訓制度與救國團。軍訓制度名義上是為了教授學生軍事訓練的術科，其實還有教官與訓導處配合的管理及監督學生紀律與思想的功能。⁶學生軍訓與救國團的結合始於1953年。救國團的前身是中國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1950年4月成立），後被併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簡稱救國團，隸屬於國防部總政治部，為國民黨的外圍組織。救國團成立於1952年10月31日，由當時身為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的蔣經國兼主任。其目的在於加強青年團結，並以三民主義教育領導全國青年，完成反共抗俄復國建國使命。⁷救國團活動招募的

5 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初期，即有進行黨化教育的意圖。但是什麼是黨化教育，定義始終模糊不清；是要灌輸黨的主張，或由黨的機構或人才去辦教育，或以黨的意識形態统一思想，莫衷一是。1929年8月，國民政府明訂黨義為大學共同必修科目；私立大學增設黨義課程者益日多。不過，多所學校執行不力，教育部也通融。某些國立學校，如武漢大學，即使得到國民政府大量資助，亦沒有完全執行。直到1944年方將三民主義訂為大學共同必修科。陳能治，《戰前十年中國的大學教育（1927-1937）》，頁59-63。

6 1951年秋天最初試行於師範院校，1954年進一步逐次推廣到各大專院校設立教育制度。李泰翰，《一九五〇年代台灣學生軍訓之研究》（台北：國史館，2011），頁37, 83-84, 118-119, 170, 194-196。

7 救國團於1953年9月成為國民黨第九知青黨部。入團條件為凡信仰三民主義，堅持反共抗俄立場，年齡在15-30歲的男女均可參加。團員須遵守八項信條：1) 信仰三民主義，2) 擁護領袖，3) 服從命令，4) 嚴守紀律，5) 自立自強，6) 實踐力行，7) 互助合作，8) 服務犧牲。幼獅出版社編，《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答客問》，《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台北：幼獅出版社，1952），頁30-35, 39。

對象以高中生與大學生為主。

蔣介石期望救國團能兼具教育性、群眾性、戰鬥性的功能。所謂教育性，乃是在三民主義的指導下推動正確的革命教育；群眾性指從學校青年擴展到整個社會參加反抗俄的隊伍；戰鬥性則為提高戰鬥情緒、學習戰鬥技能、力行勞動生活、加強服務熱忱，以應戰時需要。⁸在精神方面需要培養青年崇尚主義、領袖、國家、榮譽、責任。救國團團務在學校由軍訓處代理，軍訓教官由國防部甄選與核定。正如《自由中國》社論指出，救國團的章程號稱「申請加入」，卻又規定高中以上學生一律參加；名義上的加入，並不代表就控制了青年的心。其次，救國團的成立沒有法源依據，只有總統的指示，且浪費公帑至鉅。⁹然救國團解釋其成立依據是為了解他自身對青年，使每一位青年人都能認清是非，明辨敵我，以及了解他自身對國家民族所負的重大責任。¹⁰1960年3月，軍訓移歸教育部管轄，與救國團分離；並將原有軍事化形態，改為輔導性的委員會制，以青年社團為主要工作對象，建立青年育樂中心；廢除學生個人團員制，改為學校團體團員制。¹¹救國團在性質上有點近似於共青團，但即使在成立初期也沒有特別重視思想教育的灌輸，後來的活動「逸樂取向」更為濃厚，與政治的關係越來越淡薄。對國民黨而言，只要能將學生

8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部編，〈本團成立訓詞—中華民國四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本團重要文獻》第一輯（台北：1966），頁5-6。

9 〈社論—「今日的問題」之十二〉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自由中國》，卷18期1（1958年1月1日），頁5-7。

10 〈社論—再論青年反共救國團撤銷問題〉，《自由中國》，卷18期11（1958年6月1日），頁3。

11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部編，《團務十年》（台北：1962），頁7, 11。

精力引導於社團康樂活動，不鬧學潮，就算完成任務。¹²此外，國民黨雖然希望能夠做到以黨領校的目的，實際操作視學校校長而定。例如，臺灣大學受自由主義影響，即使校長是國民黨黨員，依然遵循自由學風，縱受干擾，也很難完全實現國民黨所期望的以黨治校。

國民黨遷臺後對中央研究院的控制比大專院校還低。朱家驊代理院長18年間（1940-1957），雖身為國民黨組織部部長，因明瞭過去在蔡元培領導之下，學術獨立於政治之外的傳統，在大陸時期從來沒有企圖在院內設置黨部組織，並尊重各所研究方向與人事。¹³至於遷台之後，中央研究院黨部何時設立，因資料散佚，一直找不到確切年份，目前僅知中央研究院曾為第三十五黨部。中研院來臺後有一不成文規定：院裡高層必須有一人為國民黨員，以貫徹黨中央的命令。院長胡適（1957-1962）、錢思亮（1970-1988）、吳大猷（1988-1993）均非國民黨黨員，故任命具有黨員身分者擔任總幹事。¹⁴朱家驊、王世杰（1962-1970）雖為黨員，也是尊重中研究的學術自由傳統。無論是院長或院士選舉，國民黨高層能夠干涉的程度十分有限，院士投票有相當高的自主性；即使偶有與黨政高層關係良好而當選院士者，亦是極少數。¹⁵早在1949年之前，中研院確立的遴選院長的傳統，是先由評議會投票選出三位院長候選人之後，再由總統圈選。即使國民黨高層有屬意的人選，如果不在三名的名單之內，也必須尊重程

12 〈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280次會議紀錄〉，1956年6月13日。國民黨史館，檔號7.3/24。

13 中央研究院八十年院史編纂委員會主編，《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台北：中央研究院，2008），頁41。

14 中央研究院早期並無副院長一職，院長之下負責院務的是總幹事。訪問陶英惠先生，2011年8月17日，地點：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5 《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頁180-181。

序。

然而，這不表示中央研究院能夠完全抵抗國民黨的意志。三民主義研究所的成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967年，即有黨國元老提議在中研院設立三民主義研究所。1970年代初，為因應臺灣退出聯合國、校園爆發釣魚台風潮、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及為了引導青年思想等，國民黨指示中研院成立三民主義研究所。院方一直以必須慎重，或預算已編，尚需時日等理由，行使拖延戰術。錢思亮院長在院內力阻多年，然黨中央有人以三民主義模範省的臺灣，不能沒有三民主義研究所為由，迫使中研院在1975年成立籌備處，六年之後正式成所。錢思亮院長雖然被迫成立三民主義研究所，但他延聘專業傑出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陳昭南擔任所長。陳昭南雖是國民黨員，晉用人才的標準卻是學位與專長，而非黨內資歷。院長也支持他的作法，因此三民所內純粹的國民黨意識形態專家人數屈指可數，反而有不少學有專精的經濟、社會、政治、法律學者。¹⁶ 由此可見國民黨仍然無法完全左右中央研究院的院務。其次，國民黨在院內仍是一鬆散組織，黨小組規定每月開會一次，常常因為沒什麼事而不開會。黨員的存在主要是繳交黨費。黨小組的組長多半推派工作不忙者擔任，不像共產黨以政治積極表現為標準。黨員多半研讀黨交代的文件或討論院務；開全院黨大會也以改善院務為主，與政治關係甚微。¹⁷ 他們沒有像共產黨員那樣過嚴格的黨組織生活。

相較之下，中共當局對待中國科學院的態度，與對待清華、輔仁等親美大學並無二致；亟欲積極改造其資產階級遺毒，成為社會主義

¹⁶ 《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頁159-162；訪問陶英惠先生，2011年8月17日。

¹⁷ 訪問陶英惠先生，2011年8月17日。

國家的最高研究機構。王揚宗處理的是1949年以後，中國科學院的內部重組。中國科學院乃是留在大陸的中央研究院與北平研究院的合體，中共將院士稱號改為學部委員。這個看似簡單的稱號改變，實則牽涉到全國最高研究機構的體制改變。1955年中國科學院的學部制度確立。當時官方人士號稱此乃過渡階段，最終還是要實行院士制度，實則不然。中共不願黨權旁落，結果在毛澤東時代一直沒有實行院士制度。即使到1994年又恢復院士的稱號，但是院士仍然不能直接選舉院長。王揚宗利用許多外人難得一見的中國科學院檔案資料，鉅細靡遺地寫出學部委員提名經過。無論是刪減或增加名額，都有濃厚的政治考量；學部委員的提名實際上是紅與專的拔河。我們可以從中共在籌組中國科學院的階段，即由中央宣傳部和統戰部主其事，在院內成立黨組，並且強力主導正副院長的任命，看出共產黨亟欲掌控科學院的強烈企圖。

王揚宗比較中國科學院和中央研究院，寫出變與不變的地方，十分精采。他雖然對政治干預學術的分析很多，也合理地指出有些弊病並非全然因為政治之故。例如，因為門生故舊多或近水樓臺，得票也較多。這點在臺灣也有近似之處，例如，李濟擔任史語所所長時，有段期間，人文組院士提名不是來自國外，便是來自史語所。霸氣十足的李濟，連曾經擔任過國民黨宣傳部長、國民政府教育部長與外交部長的王世杰院長，對他也是忍讓三分，不敢提名國內法學界的同行。¹⁸ 很難想像類似的情形會發生在共產黨掌控的中國科學院。

¹⁸ 《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頁133。

二、圖像宣傳

黨國體制的建立，不但需要黨勢力進入或滲透到各機關、團體與社會，同等重要的還有宣揚黨的理念與政策。政治宣傳的成效，更需依賴組織機構的配合、方法和工具的講究，以及宣傳內容的淺顯易懂。圖像作為宣揚政策和領袖人物的媒介，比起文字在文盲佔多數的中國，更能發揮功能。

受蘇聯影響，中共從建黨開始就重視宣傳，設有專職機構。從建黨到建國，中共前後共有 16 位宣傳部長（國民黨有 32 位），其中有一半是留學蘇聯的。¹⁹各地的黨支部也設有組織和宣傳部門，並且強調組織與宣傳相輔相成的關係。對共產黨而言，宣傳不只是單純的散播觀念、政治教育或爭取政治同盟，還必須與黨的組織及意識形態配合；黨的領導一元化與馬列主義的貫穿其中更是重要。然而，這亦非可以一蹴而成。其關鍵就在於中共利用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推行整風及思想改造，提倡批評與自我批評，強調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鍛鍊黨性，以此強化組織與黨的領導。唯有透過這樣的機制，才能達到

¹⁹ 至於成立之初，為何不直接仿效蘇聯，稱為宣傳鼓動部的原因待考。據悉 1928 年 7 月會改為宣傳鼓動部，但目前沒有看到任何由該部發出的任何指示。參見 Marianne Bastid-Bruguier, "Patterns of Propaganda Organization in the National-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in the 1920s," in Mechthild Leutner et al. e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1920s: Between Triumph and Disaste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2), p.8; 林之達主編，〈附錄三：中共中央宣傳機構及負責人簡表〉，《中國共產黨宣傳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頁 306-307；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台北：國民黨黨史會，1994），頁 33-202。

黨員唯黨是從的要求。黨一元化的真正確立是在延安整風之後。²⁰ 1949 年後，中共為因應全國的需要宣傳編制迅速擴大。宣傳部長陸定一更提醒宣傳工作者，宣傳部不是管黨校、出版、報紙等具體業務，這些只是思想工作的工具；宣傳部是幫助黨委掌管整個思想戰線。²¹ 在既有的基礎上，特別是延安整風形成的黨的一元化領導，中共的宣傳體制愈臻完善。

同時學習蘇俄的國共兩黨，共產黨學到精髓，國民黨學到皮毛。民國初年，改組後的國民黨新添了組織部，且強化了宣傳部。但是與共產黨相比，其間差異頗大。第一，最初掌管和活躍於組織與宣傳部門的多為跨黨份子；資深且有份量的國民黨員，對這些部門的工作興趣缺缺。國民黨從 1927 年分共到 1949 年，宣傳與組織部門負責人雖都由資深黨員擔任，然其更迭之頻繁令人咋舌，宣傳部長幾乎每年一換。第二，宣傳部門和組織部幾乎各行其是，中央與地方亦是不同的步調。第三，國民黨奉為圭臬的三民主義，內容鬆散龐雜，可以詮釋的空間很大。中共的馬列主義相對嚴謹，加上組織、宣傳、動員與意識形態由上而下的貫串，效率高，基本上能確保黨路線的執行。內戰時期，近似心戰的宣傳競賽，國民黨會一敗塗地，不是沒有原因的。²²

²⁰ 參見陳永發，《延安的陰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²¹ 陸定一，〈應當糾正宣傳工作中的形式主義——給張際春同志的信（1956 年 3 月 23 日）〉，《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49-1956》（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卷 3，頁 1096。

²² 參見余敏玲，〈「偉大領袖」vs.「人民公敵」：從蔣介石形象塑造看國共宣傳戰，1945-1949〉，〈蔣介石與現代中國再評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 年 6 月 27-29 日。

蔣介石認為國民黨在內戰的慘敗，宣傳不力是關鍵之一。來臺後，痛定思痛，於1950年成立了中央改造委員會，將政治宣傳視為反共復國的精神骨幹之一。其所訂定的宣傳目標為：對內，爭取民眾對黨反共抗俄政策的了解與支持；對外，爭取國際人士的同情與合作。宣傳機構因而擴編，第四組（簡稱中四組；1972年改名中央文工工作會，簡稱文工會）專司對臺灣島內的宣傳工作，海外宣傳由第三組（後稱海工會）負責，敵後（大陸）宣傳由第六組（後稱陸工會）負責。1950年代初期，蔣介石親自主持經常性的宣傳決策會議，參加者除外交、宣傳的黨政機構負責人及其實務工作者外，還有蔣的親信。如此形成了宣傳決策核心，蔣介石甚至親訂反共標語32條。²³儘管如此，宣傳部門確立及其決策核心的形成，並不意味組織部門能夠與之密切配合。從當時蔣介石一再強調宣傳與組織不能各行其是，可見問題依舊。²⁴

其次，國民黨亦試圖改善宣傳方式。1949年以前國民黨宣傳對象以知識份子為主，重視的宣傳媒介是文字型的報刊雜誌。然而撰文者卻很少顧及讀者的反應，視文宣如作文比賽，鮮少琢磨宣傳技巧。這些弊病在國共內戰時期，展露無遺，國民黨也因此付出昂貴代價。1949年以後國民黨開始重視下層民眾，提倡宣傳下鄉，因而有巡迴車到山地或各鄉鎮作文化宣傳。在媒介上也變得較為多元化，除了傳統的報紙、書刊之外，還有反共歌曲、戲劇（布袋戲、歌仔戲、話

²³ 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1951-196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32（2009年11月），頁222-234；中央改造委員會編，《中國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黨務報告》（下篇）（台北：1952年10月），頁103。

²⁴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編，《總裁重要號召及有關宣傳問題訓示集要》（台北：1963），頁138，149-154。

劇）、民間雜藝、電影、新聞影片等。事實上，這些形式國民黨在大陸時期也曾討論過，只是鮮少付諸實行；即或曾經利用過，頻率亦低。同時，啓用俄國十月革命後已有的交通工具宣傳方式，在島內增設了鐵路公路宣傳列車、出海宣傳輪，要求在各地及各項商品（車票、火柴、菸盒、酒瓶等）張貼或加印反共標語。其中以收音廣播最受重視，期望在各鄉鎮能達到「一里一收音機」的目標。²⁵

可數的是，來臺後國民黨的宣傳與內戰時期相比，改善有限。這可從1955年國民黨檢討宣傳問題，看出端倪。當時中央委員會舉列出來的宣傳面臨的問題有：1) 如何寫出讓農工群眾易懂與喜愛的文字；以目前黨營報刊而言，為基層民眾接受者不多。2) 如何加強宣傳與反映民眾心理的配合。3) 如何加強宣傳與組織訓練的配合。4) 如何加強藝術宣傳；藝術是可以達成宣傳下鄉的利器，其中尤以戲劇最重要，但目前連臺北仍無一個良好的劇場。劇本來源的恐慌、戲劇人員的培育、地方戲劇的改良均須注意。²⁶基本上，有關當局知道問題所在，但是宣傳的思維及運作模式和內戰時期相距不遠，並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改革方案，更多的是紙上談兵。特別是在當時物質環境下，寄望臺北須有一個良好劇場，才能作好宣傳的想法，更是一種精英與城市為重的思維。

不過，還是不能因此完全否定國民黨的力圖改善宣傳方式。無可否認地，來臺後的國民黨宣傳媒介遠比大陸時期多樣化，尤其是非文

²⁵ 中央改造委員會編，《中國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黨務報告》（下篇），頁103；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紀錄〉（台北：1955年10月），頁87。

²⁶ 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紀錄》，頁86-87。

字型的宣傳，漫畫就是其中一例。張世瑛的論文是國內首篇研究國民黨非文字宣傳的力作，他透過黨營報紙出版的政治漫畫宣傳反共抗俄的國策，帶領讀者進入一個新的世界。黨營漫畫副刊在1953年大多停刊，然到1950年代後期仍有反共漫畫的出版；他們雖然不是刊登在國民黨的機關刊物，仍是黨授意之下的產物。例如，山巴（邱錫勳）的〈反共小英雄〉、劉興欽的〈反共雙槍俠〉，及陳海虹的〈小俠龍捲風〉。根據陳海虹的說法，他是以小俠對抗魔教的故事，比喻臺灣（小俠）為復興基地，對抗中共「匪幫」（魔教）。²⁷ 只是這樣的隱喻，對於以看故事和圖片為主要興趣的兒童，恐怕很難理解其中的微言大義。臺灣的政治漫畫到了1960年代開始走下坡，這可能與當時政府頒定連環圖畫輔導辦法（即審查制）有關。這也反映出國民黨其實對以漫畫為主的圖像宣傳，熱度不長；為何如此，引人深思。

論及圖像宣傳媒介，海報（中共稱之為宣傳畫或招貼畫）其實要比漫畫可以流傳更廣，更不受限制。海報可以張貼在大街小巷，各地醒目的位置。好的海報即使沒有文字解說，簡單幾筆，也能達到老幼能解的目的。海報在政治宣傳上大量使用且最成功的例子莫過於俄國內戰。當時布爾什維克黨網羅了一批傑出的藝術家，以簡單幽默或震撼人心的筆觸，醜化敵人，也宣揚共產黨的理念。²⁸ 國民黨北伐期間，曾經印製過一些政治海報。²⁹ 然而，最令人納悶的是，國民黨從

27 山巴（邱錫勳），〈反共小英雄〉，《漫畫大王》，1958年12月開始連載；劉興欽，〈反共雙槍俠〉，《台灣漫畫週刊》1960；陳海虹，〈小俠龍捲風〉，《漫畫大王》1958。詳洪德麟，《台灣漫畫40年初探》（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頁71-88。

28 Stephen White, *The Bolshevik Poste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9 參見黃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美術活動史話》（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6），頁38-45。

清共之後、1930年代，甚至來臺以後，電影海報或其他商業海報經常可見，唯獨政治海報零零星星。為什麼？箇中原因值得探討。

相異於國民黨，中共從建黨開始就重視對下層階級的宣傳；也因為中共的根據地在農村，必須更重視非文字的圖像與口語傳播，方能達到目的。中共承繼俄共擅於運用政治海報的特點，加上魯迅推展木刻運動的促進力量，使得海報與漫畫在宣傳革命上有相輔相成之功。抗戰期間中共將西方木刻與中國年畫藝術結合，發揚光大，積極且成功地運用在政治宣傳上。³⁰ 中共執政後，掌握了國家機器與物資，大量運用圖象宣傳，如電影、下鄉巡迴的幻燈片隊等等，但政治海報並沒有因此被打入冷宮，反而大力提倡。例如1951年春，北京舉行蘇聯宣傳畫和諷刺畫展覽會。1959年底舉辦十年宣傳畫展，共展出175幅政治宣傳畫。以圖像而言，國共呈鮮明對比。國民黨在1950年代初期之後的圖像宣傳，越來越不重視，中共則是越來越多。³¹ 可能因為大陸1950年代的海報留存下來的較少，當前最引人注意的是文革時期的海報研究。³²

國民黨在臺灣的宣傳主軸是反共抗俄政策，民族救星蔣介石的形象雖也是宣傳內容的一部分，卻沒有像中共那樣大規模地宣傳毛澤東

30 參見洪長泰，《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台北：一方出版社，2003），頁111-117，145-150。

31 洪長泰的新書即有兩章處理中共建國後利用圖像的宣傳。見 Chang-Tai Hung, *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55-209.

32 如，張忠龍編，《毛澤東歷史視象：經典海報畫冊》（香港：次文化堂，1994）；Stefan Landsberger, *Chinese Propaganda Posters: From Revolution to Modernization* (Amsterdam: The Pepin Press, 1995); Harriet Evans & Stephanie Donald ed., *Picturing Powe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oste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9)。

形象，甚至走向極端的個人崇拜。毛澤東的光輝形像，除了訴諸報刊、文學等文字形式之外，早在抗戰期間已有許多非文字如音樂、美術等作品頌揚他的偉大；並用「紅燈籠」、「太陽」、「北斗星」、「火炬」等與「光」有關的形象來比喻毛。³³建國之後，宣傳毛圖像的比率遽增。文革期間毛澤東就是黨的化身，而他的受人矚目並沒有因為文革的結束而消失。無論在毛澤東的生前或死後，無論在政治或非政治方面，至今依然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以他為主題的視覺作品所展現的多重形象及其隱含的意義，值得進一步的探討。梅嘉樂(Barbara Miltler)，運用海報、繪畫、徽章、雕刻，甚至護身符等多種媒介，說明毛澤東的形象在文革前後，甚至今日，都廣受注意。

梅嘉樂質問，如果毛澤東只有張戒的傳記《鮮為人知的毛澤東》所描述的魔鬼那一面，那麼為何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多年，毛形象的作品在今日中國依然流行？她的研究指出，毛的形象事實上是多重，而非單一的。時至今日，仍有許多中國人認為毛象徵美好的、平等的和利他的過去。梅嘉樂並以文革時期所展現的毛澤東形象作為標準，討論出現在文革之前和之後有關毛的藝術作品的異同。無論今昔有關毛澤東的作品是對其表示推崇、嘲弄、批判或嬉戲的態度，都必須有官方宣傳的標準毛形象作為背景，否則即使想顛覆他的形象，也無法達到目的。縱然文革已經結束，毛澤東已經死亡，毛的形象無所不在，成為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成為今日中國流行文化的一部分。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因此也是研究毛澤東與當代中國難以迴避的問題。

33 洪長泰，《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頁 206-209。

三、族群政治

國共對族群問題的思索向來是政治考量高於一切。基於國防、戰略與統一的考量，中共建政以來對於居住在廣袤領土上的少數民族，一直不敢輕忽，且積極運用黨國意識形態與制度爭取民心及認同，期望將全國 56 個少數民族，全數納入黨國體系之中。而國民黨早期對於族群問題的漠視和壓制，反而造成日後黨國體制崩解的要素之一。

這個部分的標題以「族群」包含「民族」，主要考量是使用「族群」一詞討論臺灣的省籍問題比較方便。「民族」與「族群」有許多共通的地方，他們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民族通常牽涉到「政治主權」的觀念。³⁴「民族」與「族群」可以成為互相置換的名詞，是晚近十多年來的事。按照美國社會學家 Richard A. Schermerhorn 對“ethnic group”「族群」的定義：大社會中的集體（次團體），其成員擁有真實或假設（想像）的共同祖先，有共同歷史記憶，有自我定義的特別文化表徵（其中包括親屬模式、宗教信仰、語言或方言、部族、國籍、地域主義等）。通常數量佔優勢的民族，如美國的白種人、中國的漢人，不會將自己當成一個族群；只有當一弱勢族群界定這個多數族群，後者才會產生「我族」的族群意識。此外，從 1970 年代以後美國人類學者已經不認為「種族」是個合適於分析或價值中立的概念，反而是帶有歧視、社會不平等的觀念。「民族」、「種族」、「族群」雖然可以有不同的範疇，但也可能形成彼此穿透或競逐的「拉雜共構」情形。所謂「拉雜共構」就是「相互假借、比喻、穿鑿附會，共同建

34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4），頁 5。

構一個整體的故事」。省籍問題會演變成「族群關係」，是經過許多的拉雜共構而成，在臺灣特別是和「國家認同」掛勾。³⁵

對國共而言，兩黨所面臨的學術建制及圖像宣傳，性質相似；政異的是範圍或規模的大小。族群問題則不然，兩黨所面臨的不僅是數量與種類之別，更大的性質差異來自於兩黨對「民族」的分類或定義，以及所轄領土的大小，因此很難處處作同等比較。國民黨在臺灣所面臨的原住民，是唯一擁有同族群所居土地的「非漢民族」。滿、蒙、藏、回族雖也不是漢人，但他們在臺灣都沒有同族群居在自成一區的土地上。同時，原住民所居之地不涉及國家主權或國防、戰略等問題，處理起來相對地容易。相比之下，中共面對的是佔有全中國土地六分之一的新疆，佔有八分之一土地的西藏，生活在西南或東北的眾多少數民族，加上有國家主權及國防的考量，其所面臨的挑戰，遠比侷促一隅的國民黨要巨大和複雜得多。

國民黨初建之際，民族問題一直為其關切的焦點之一。辛亥革命後的孫逸仙的民族觀，由排滿變成「漢、滿、蒙、回、藏」的五族共和。孫所言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實際上是以漢族取代滿族的民族觀念。孫認為民族乃是由血統、生活、語言、宗教、風俗習慣構成。1943年，蔣介石發表的《中國之命運》主張「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和而成的。這多數的宗族，本是一個種族和一個體系的分支。……他們各依其地理環境的差異，而有不同的文化。由於文化的不同，而啟族性的分別。」³⁶由於同源或婚姻關係，而成宗族，形成一個大家

35 張茂桂，〈族群關係〉，收入王振寰、瞿海源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出版公司，2003年，二版），頁216-229；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頁13-14。

36 蔣中正，《中國之命運》（台北：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76），頁2。

庭；而五族之外的其他少數民族，被視為部落。蔣的民族構成觀比孫更重視「血統」關係。

其次，國民黨在民族政策方面，主張以三民主義來治理，尋求全國統一。1929年，國民黨召開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蒙回藏族的政治決議，只要求住在這些地區的人民必須實行三民主義。1931年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特別注重邊地的開發及其人民的生計。1935年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提到：「重邊政，弘教化，以固國族而成統一。」1945年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中對邊疆政策指出：「政府處理蒙藏事務，一以三民主義為最高原則，一個宗族一律平等為基點，進求融合其文化習俗，消弭狹隘之部落界限。一面培養各宗族之自治能力。」國民黨雖一再重申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然其民族融合的實質是民族同化——以漢人的文化來同化不同民族的文化。³⁷二次大戰後及來臺國民黨的民族觀與民族政策仍是延續這樣的思維。簡言之，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沒有「少數民族」的概念；只有邊疆政策，沒有民族政策。國民黨邊疆政策的施政核心在於實行三民主義，至於如何施行與落實、具體方法為何，鮮有討論。

國民黨最初對原住民的界定仍是沿用部落與宗族分支的概念。詹素娟的文章詳細地論述臺灣原住民的稱呼與自我稱呼的歷史變遷過程，時間跨度從二戰後一直寫到二十世紀末。1945年，國民政府接收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對島上原住民以「高山族」，取代日本人的「蕃族」稱呼；1947年，又改稱為「山地同胞」，簡稱山胞。一直到蔣介

37 李國棟，《民國時期的民族問題於國民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頁152-162；趙學先等編著，《中國國民黨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0），頁121-126。

石過世後，隨著臺灣黨國體制的逐漸鬆動，1983年開始有原住民大學生發起的「台灣高山族民族自覺運動」，爭取少數民族的身分與基本權益，伴之而來的是原住民「正名」運動。經過十年的奮鬥，終於在1994年促使「山胞」一詞走入歷史。1997年的修憲，原住民取得了「民族」的較高位階。國民黨對原住民身分認定與稱呼的改變，反映出其民族觀從「宗族」與「部落」到「民族」的演進，此乃因黨國體制的鬆動，社會的多元化逐漸形成，國民黨的「民族」等於「宗族」的定義與政策受到質疑和挑戰所致。

如果說國民黨在蔣介石時代向來不認為原住民是少數民族，那麼對於發生在漢人之間的外省人與本省人，基於歷史文化、生活習慣差異及制度不平等造成的族群問題，更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衝突產生之時，則儘量壓制，不願正視問題的存在並試圖解決，結果留下嚴重的後遺症，造成日後越來越難解的族群怨懟與衝突。

許雪姬的論文正是處理臺灣的省籍族群問題的歷史根源及其發展。她將其歷史源頭溯自清代、日治時期，並認為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證明了臺灣族群問題已經十分嚴重。1950年代初期，國民黨中的有心人士希望能消弭省籍分歧，因而創辦了《旁觀雜誌》。然而該雜誌批評政府政策，並將其與日本的統治相比較，被有關當局視為對黨國權威的挑戰，結果遭到停刊的命運。此後，鮮有刊物討論省籍問題，國民黨也利用各種政治手段壓制省籍問題的討論。由於省籍族群問題被壓抑過久，沒有經過適當的疏導和溝通階段，導致解嚴之後，頓時如火山爆發一般，熔岩四處流竄。國民政府遷臺初期，人民縱或有國家認同的問題，不至於太嚴重。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對國民黨統治的不滿，在解嚴、開放大陸探親後，國家認同的問題漸漸浮現，使得族群關係日益緊張；加上選舉時期的各黨派候選人操弄，

省籍問題不幸成為臺灣一條最敏感的神經，也是造成今日臺灣在關鍵議題上難有共識的要因之一。

相似於臺灣因為外來政治權力的介入而產生的省籍族群問題，在中國大陸也曾發生，最明顯的是南下幹部問題；中共官方對挑戰他們的本地幹部，一概以「地方主義」名之。這與國民黨來臺之初一直將「台灣人意識」當成「地方主義」、「省籍意識」、「區域意識」，³⁸倒是不謀而合。1950年代初中共當局分配幹部南下，接收或接管新佔領區或實行土地改革，這些幹部與當地幹部造成的衝突，部分要因實則就是省籍族群衝突而起。不過，目前大陸學者出版的著作中，均以中央與地方的權力之爭來解釋，完全忽略文化差異等問題導致的族群衝突。³⁹

相對於漢人內部的族群問題，中共更關注的是非漢的少數民族問題。中共的民族觀在吳啓訥的論文已有討論，茲不贅述。中共民族政策與國民黨的最大區別，在於加入了蘇聯的民族識別經驗；「識別」不完全是根據民族學的標準，而是有更多的政治考量。吳文全面剖析了中共的「民族識別」體制與政策，對僅族的分析尤為過去研究所忽視。雖然有大批民族學家參與了民族識別工作，由於受到中共指導思想與黨國體制的制約；因而無論是化異為同，還是化同為異，都留下許多後遺症。大陸幅員廣大，西南方面的族群問題與蒙古、新疆、西

38 張茂桂，〈族群關係〉，《社會學與台灣社會》，頁222。

39 其中提到最多的是廣東「地方主義」。陳模，〈古大存冤案及其平反〉，《炎黃春秋》，期12（2001），頁26-31；張江明、劉子健，〈廣東省“地方”地方主義冤案始末〉，《炎黃春秋》，期6（1995），頁33-38；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1）〉（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頁389-394；James Z. Gao（高崢），*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藏很不一樣。但是中共爲了兼顧 56 個民族，制定的政策很難包含一切，自然造成困難與問題。最重要的是，中共民族識別的理念和手段在實際操作下，出現自相矛盾的情況，這些矛盾的出現，正好曝露出中共背後的政治目的。

全書之中，唯一同時以兩岸作爲對照比較的是張中復的文章。它的時間跨度長、議題多；從西方學者的觀點到明清以來中國政府如何看待與界定中國的穆斯林，以及臺海兩岸穆斯林應該以民族，還是宗教來界定自己和漢族的關係，均有討論。張中復認爲國共均是在族國體制（多民族所形成的國家）的概念下，藉由「漢」與「非漢」人群區隔與共生關係，來形塑民族／族群。國民黨的一個「回族」，在中共治下則劃分爲十個「穆斯林少數民族」（包括說突厥語、伊朗語、蒙古語者）。國民黨將漢地回族視爲「內地生活習慣特殊之國民」，是「漢人」的一個分支，雖有主從之別，但基本上不干涉其內部生活。中共則視漢回是大家族中平等的一員，亦是少數民族的一支。中共承認回民的非漢身分，也增加了對其政治干預。張文談的雖然是族國體制，但是「族」的定義最後還是由獨大的一黨來決定，成爲黨國體制中的一部分。

國共的民族觀及其政策，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兩黨有志一同的是：爲了國家的統一與國防的需要，不容許非漢族有分裂國土的行爲。國共兩黨均號稱各民族一律平等，實則所施行的民族政策，基本上還是從漢人的立場出發。中共指責南京國民政府的民族同化政策是漢人沙文主義；然中共將大量漢人遷入新疆、內蒙、西藏，未嘗沒有改變民族人口比例、增加漢人影響力的意圖在內。此外，國共的民族政策均有因時制宜之處。國民黨自南京政府以降，對內向來反對民族自決，來臺後治不及西藏時，卻又贊成民族自決。反之，中共在 1938

年以前，提倡民族自決，少數民族可以自由選擇是否加入未來的「民主聯邦制」中國；1938 年以後因反對日本利用民族自決口號策動蒙、回族的依附，及爲解決在邊區的民族問題，遂主張在中國統一（沒有聯邦制的選項）的前提下，施行「民族區域自治」。⁴⁰ 中共的民族識別法學自蘇聯，因應中國現實情況也作了調整，將中國的民族由國民黨的五族，識別出 56 族來；並進一步在各少數民族地區，建立黨組織，培養積極份子，訓練黨幹部。南京時期的國民黨一如中共，也會在邊疆地區建立黨的組織，但名存實亡，作用不大。⁴¹ 其次，國民黨培植的非漢族幹部（中央政治學校邊疆幹部班），以當地上層子弟爲主，這與共產黨的幹部主要來自下層社會，差別很大。再者，中共至少給予少數民族發展自己語言和文化的機會，國民黨連這個都沒有。

不過，臺灣解嚴之後，多元文化日受重視，政府也逐漸承認並尊重原住民自己的文化。其次，由於原住民對於國民黨的政權向來不具威脅性，加上不像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區的少數民族，牽涉到政權合法性與鄰國的疆界問題，原住民居住的地區也沒有資源和戰略價值的問題，因此國民黨的對原住民的政治控制，不像中共控制少數民族那麼嚴厲。

40 張遇民，《共匪暴政下之邊疆民族》（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8）；松本眞澄著，魯忠慧譯，《中國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 1945 年的「民族論」爲中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頁 170-175, 224-232, 238-248。中共自 1938 至 1949 年，從民族自決和聯邦制轉變成民族區域自治的過程，詳何龍群，《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頁 75-110。

41 南京政府時期國民黨在邊疆的活動及幹部訓練等，至今在資料和研究方面均嚴重不足，亟待開發。

* * * * *

1949年之後兩岸政權的分立與分治，並不同於兩岸的分途，亦非意味著兩黨統治理念與制度的完全南轅北轍。雖然國共分屬於不同陣營，在意識形態及政治、經濟、文化所建立的制度，差異良多；不謀而合的是兩黨均實行黨國體制。

兩岸分治後的國共兩黨，莫不急於建立黨國體制，試圖藉著以黨領政，來鞏固其政權及維護其合法性。蔣介石和毛澤東統治時期，全球冷戰形成壁壘分明的兩大陣營，當時兩岸均處於比較隔絕孤立的環境，資訊不流通，使得黨國體制容易建立與維持。不過，從本書各章的結論顯示，相較於共產黨，國民黨的統治更貼切地說是威權統治，其中縫隙更多。以學術建制為例，中共黨的組織對學術機構的控制，遠比國民黨要嚴密得多。這牽涉到兩黨組織與意識形態強弱的問題，導致國共有不同的取徑，因此能夠貫徹的程度也大有不同。中共在宣傳方面亦是如此。

眾所皆知，毛澤東的形象從延安時期迭有宣傳，到了文革因為個人崇拜的盛行，推展到高峰。經過文革的密集宣傳，什麼是毛澤東的正確形象已經深植人心。正是奠基於此，改革開放後，各種毛像作品的出現，無論出於反諷或嬉戲心理，都是對既有的官方宣傳形象的回應或反射。這中間就出現了十分有趣的現象：一方面是中共黨國體制宣傳系統有效地施行，使得正確的毛形象廣為人知。另一方面，對於與毛官方形象背道而馳的作品，正也反映出黨國體制出現的縫隙，其根基已經不若改革開放前那麼穩固了。同樣地，臺灣原住民民的位階能從部落提高的民族，亦是受到黨國體制鬆動之賜。在宣傳或族群方面，當外來訊息的增加，社會開始多元化，黨國體制因而鬆動所出現的裂縫，成為最值得細究的地方。

不過，歷史的發展充滿弔詭。黨國體制的崩解在臺灣部分源於族群矛盾。誠如錢永祥所言，臺灣民主化的主要動力之一，來自於過去蔣介石的國民黨所不願正視的族群矛盾。國民黨遷臺後，政治權力主要掌握在佔全島人口12%外省人手中。由於歷史原因使然，本省人的身分認同與價值觀與外省人有些地方不大相同，而權力集中在外省人手裏，造成本省人有很強烈的疏離感。本省人主要走中小企業的發展道路，形成臺灣社會的中堅力量。他們得到一定的經濟力量之後，自然對當時政治權力的分配高度不滿，進而要求開放更大的參與政治空間。在臺灣，所謂「反對者」與「統治者」的矛盾，正好契合族群間的界線。族群的區別具有很強的動員能力，族群議題一旦成形，「我們」與「他們」就分開了，陣營的區分非常明確。⁴² 族群問題在臺灣遂成為兩面刃，一方面促成臺灣民主的進展，一方面也因為族群問題與國家認同的糾結不清，造成社會分裂，至今仍難形成全國共識，從而可以共同面對與試圖解決國際社會給予臺灣人民的種種挑戰。

冷戰時期，國民黨的黨國體制較易鬆動，除了有美國等外在因素，還有另一要素亦須列入考量。那就是國民黨不像共產黨那樣將所有生產工具國有化。中共將所有生產工具收歸國營，藉此來控制人民食衣住行育樂等的方方面面，使得老百姓除了依附黨國，別無他路可以生存，也因此造就了中共更為嚴密的黨國體制。而國民黨雖有大量國營企業，仍允許私人經濟存在，這就為社會留了一個活路。凡不見容於國民黨的黨國體制者，仍可以在私營經濟中求生存。當這些人形成足夠力量，反過來會衝撞黨國體制，這也是造成臺灣黨國體制崩解的

42 黃曉峰、丁雄飛，〈錢永祥談臺灣的政治轉型〉，《東方早報》，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11/12/696153_2.shtml，下載日期：2011年12月3日。

另一要因。

在討論國共黨國體制異同之餘，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面向，是中國大陸和蘇聯的比較。兩國在意識形態和制度上固然有許多相同或相似之處，然而由於文化與國情的不同，還是會產生諸多差異。以本書的三個主題為例，兩者在宣傳方面頗多契合之處，民族識別政策的異同在吳啓訥的文章已有說明，這裡僅舉出學術建制上的若干差別，作為參考。其一，蘇聯的黨組織不是直接進駐科學院，而是透過科學院的秘書處而存在，並受其所在地的區黨部指揮。中國科學院則是將黨組設在院內，直接由中共中央掌控。蘇聯科學院院長在1951年之前都不是黨員，自然科學院士也享有不少質詢政府政策的自由。⁴³換言之，即使在史達林掌權下的黨國體制高峯期，蘇聯當局對科學院的控制不若中共嚴厲。顯而易見地，中共比蘇共對科學院的政治介入更深。其二，蘇聯的院系調整重點在於對自然學科作更專門的細分，主要調整工農學科方面，也過度強調其與工業生產的配合。⁴⁴中國院系調整主要是為了思想改造，人文學科反而成了改造重點。中共嚴格要求高校教師要服從組織分配。教師若抗拒調配，只有失業一途；最後

43 Vera Tolz,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s: Bolsheviks and Academicians in the 1920s and 1930s," in Michael David-Fox & Gyorgy Peteri ed., *Academia in Uphaval: Origins, Transfer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the Communist Academic Regime in Russia and East Central Europe* (Westport, CT & London: Bergin & Garvey, 2000), pp. 59, 68.

44 在這期間，十分窄化的技術教育甚至取代了黨員訓練中的馬克思社會學科的核心課程。Michael David-Fox, "The Assault on the Universities and the Dynamics of Stalin's 'Great Break', 1928-1932," *Academia in Uphaval: Origins, Transfer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the Communist Academic Regime in Russia and East Central Europe*, pp. 83-88.

只能放棄個人生活、興趣或其他考量而屈從。⁴⁵這是中共收編高級知識份子關鍵性的一步。其三，蘇聯當局對知識份子的尊重遠勝於中國。1953年，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稼夫率領科學院代表團訪問蘇聯，並與蘇聯科學家舉行座談，當場有些蘇聯科學家明白表示中共對待知識份子的態度「簡單粗暴」。他們舉列寧為例，說明十月革命後不少科學家選擇離開，蘇聯嚴重缺乏科技人才，當時蘇共儘可能地設法挽留科學家，尊重他們的習慣，為他們的研究工作提供優越的條件。⁴⁶反觀中國大陸隨著鎮反、反右一波高過一波的政治運動，對知識份子的摧殘，卻是日益嚴重。中蘇這些差異是如何產生的，亦是值得繼續探究的問題。

總之，本書各文提出了許多可以重新思考的問題與方向。我們無意，也不可能回答所有的問題。如果本書能夠有拋磚引玉之效，激發更多人的興趣與關注，投入冷戰以來的兩岸歷史研究，共同澆灌這塊新園地，那麼就達到本書出版的目的了。

45 〈上海交通大學等五校教師對院系調整的反映〉，《內部參考》，期192（1952年8月22日），頁292-294。

46 張稼夫，〈中國科學院的初創工作〉，《中共黨史資料》，期1（2003），頁48。例如，著名生理學家巴甫洛夫在政治上是反對派，科學院安排六個黨員當他的助理，都被他轟出來，但列寧還是尊重他。不但列寧如此，連史達林對他也是敬重有加。即使巴甫洛夫一再抗議當局不該逮捕知識份子和摧毀教堂，史達林依然用禮物及各種恩惠討好他。Rachel Polonsky, *Molotov's Magic Lantern: A Journey in Russian History* (London: Faber & Faber, 2010), p.189.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兩岸分治：學術建制、圖像宣傳與族群政治 (1945-2000) /
余敏玲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中研院近史所，民
101.07

面；公分

ISBN 978-986-03-3147-9 (平裝)

1. 兩岸關係 2. 政治發展 3. 族群認同 4. 冷戰

573.09

101014048